Chinese Study Monthly

中华研究月刊

https://doi.org/10.70731/gqs8xq85

The Solitary Life of Intellectuals During the Fall of Hong Kong: A Case Study of The Diary of Chen Junbao in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香港沦陷时期文人的孤苦生活
——以《陈君葆日记》为中心

Manman Zhou [a, *]

[a]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

KEYWORDS

Japanese-Occupied Hong Kong, Chen Junbao, Repatriation Policy

ABSTRACT

On September 15, 1931, Chan Kwan-po, after a decade of overseas Chinese education in Southeast Asia, returned to China, aiming to revitalize Chinese education. Just three days later, the September 18th Incident erupted. As the situ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worsened, his educational inspection plan in northern China was terminated, and he returned to Hong Kong, starting his journey of "national salvation". In 1937, following the outbreak of the full - scal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on July 7, Chen shifted his efforts from "national salvation" to "resisting the war". But the fall of Hong Kong on December 25, 1941, changed everyth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dampened his patriotic enthusiasm, turning him into a solitary literatus in a war - torn Hong Kong. This paper uses Chan Kwan-po's diary as the core source, complemented by other relevant historical materials. It focuses on exploring how the lives of Hong Kong literati changed from the early days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to the occupation period. By analyzing these changes, it exposes the lonely and miserable lives of Hong Kong literati, which were the result of "home - coming policy" by Japan, a tool used by the invaders to manipulate and suppress the local population.

摘 要

1931 年 9 月 15 日，陈君葆告别南洋十年的华侨教育工作，怀揣振兴中国教育的报国之心重回祖国。三天后，九·一八事变爆发，随着国内外形势愈发严峻，北上教育考察被迫终止，陈君葆回到香港转向“救国”之路。1937 年 7 月 7 日，全面抗战开始后，陈君葆又由“救国”转向“抗战”之路。1941 年 12 月 25 日，香港沦陷，日军的统治夺走了他先前的救国抗日激情，使他不得不成为在剩水残山之中的孤岛文人。本文以陈君葆的日记为中心，结合其他相关史料，观察抗日战争前期至沦陷时期香港文人的生活如何变化，揭示日本借“归乡政策”名义所造成的香港文人孤独、苦闷的生活。

1. 引言

抗日战争爆发后，香港一直发挥着与众不同的重要作用。目前学术界对于香港在抗日战争前期对于内地抗战的重要战略地位已有许多研究，其中关于内地知识分子南下的过程及意译也有讨论，主要成果涉及香港大营救、东江纵队、路线研究等。同时，对于日据香港时期的“三年零八个月”黑暗社会生活也有不少著作，包括回忆录、口述史等形式。但是目前学术

*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address: 614307900@qq.com.

Received 02 April 2025; Received in revised form 14 May 2025; Accepted 25 June 2025; Available online 30 June 2025.
2759-8934 / © 2025 The Author(s). Published by Jandoo Press. This is an open access article under the CC BY 4.0 license.

界对于那些香港本土文人，未曾在抗日时期离开香港的文化人及他们的生活、思想研究不足。在“以华治华”的政策下，日本统治者对于这一批文化人持怎样的态度？这一批文化人又与日军政府发生了怎样的联系？他们内心的想法与实际行为是否存在差异？本文拟根据日据时期留港文人陈君葆在日记中的记述，通过这位香港文人的观察与记载，观察抗日战争前期至沦陷时期在港文人的生活如何变化。

2. 抗日战争前期：积极投身救国与抗战宣传

1931 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标志着日本侵华战争的开始，这一天也是陈君葆从工作十年的南洋再回到香港的第三天。面对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陈君葆密切关注内地抗战状况，每天在日记中记载着自己的所见所闻与所思所想。1932 年 1 月 28 日淞沪战争爆发时，陈君葆在日记中记录着日本侵略者的暴行，“今日的消息极不好，日本竟于吴铁城接纳条件之后硬派水兵登陆攻取闸北。同时派飞机向闸北一带投炸弹，民房被焚者不知凡几，火至今晨三时还没熄。日人之残暴，乃一至于是!”[1]同时也为成功的抵抗感到兴奋，“容某说他银行里接到电报日军被十九路军大败，报载吴淞炮台击沉日驱逐舰一艘，民气似为一伸。”[2]对于回国后的工作筹划，陈君葆在日记中写到：“不过我既薄‘洋官’而不做，中国政局又如此坏，为后一辈计似乎救国尚另有道。”对于英殖民者的奴隶教育和在殖民体系中的官员，陈君葆与身边好友在交谈中都表示持负面的态度，[3]因此陈君葆不会为英殖民者做事。但内地战乱的严峻形势又使陈君葆一直酝酿的北上教育考察被迫终止，此时留港待业的陈君葆给自己选择了“救国”这条道路。但“救国”的口号喊出来，如何落实到实际的中国是在港的一批与陈君葆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的思考。这一时期陈君葆在日记中所记交往密切的香港文人有黄天石、谢维础、龙賡秀、杨炳吉、林东木、李凤坡、杨士端等，这些人物当中大部分都是香港新文学作家与左派人士。他们常聚在一起开会谈话，提出过广西垦殖计划、办《九龙日报》这两个设想，但随着黄天石离开香港前往广西考察以及办报的资金短缺等问题，这些设想几乎都有始无终。

1934 年 9 月 12 日陈君葆正式入职香港大学，担任中文学院教师与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馆长。在日记中陈君葆记有学校当局对其的期望，“希望我能帮忙将中文部弄成在中国学术界有地位的机关，末后又说希望我每年暑假能到华北去游一赵,和学术界多发生关系，说不定明年大学会派我到北平去住一年，作长期的观察研究，俾对大学作相当贡献,相当改革。”[4]这也正合陈君葆最初回国时的想法，发展振兴中国教育事业。最重要的是，入职港大赋予了陈君葆新的身份和责任，也为陈君葆的“救国”之路提供了一个更广阔也更有执行力的平台。在这里，陈君葆与内地访港文人政客有机会进行更多的接触与交流。据日记记载，自入职至香港沦陷前，陈君葆与陈受颐、胡适、陈望道、竺可桢、熊希龄、何香龄、廖承志、廖梦醒、陶行知、邓颖超、徐悲鸿、柳亚子、陈寅恪等衆多北方知识分子在港会谈或书信交往。同时陈君葆也接触到香港社会其他重要的华人精英，例如周寿臣、罗旭和、何东、胡文虎等人，他们都与香港大学关系密切，也在香港沦陷时期成爲日军的重点关注对象。港大的所见所闻与所识使陈君葆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整个中国面对的严峻形势，使“救国”这一口号真正找到清晰的出口。在港大，陈君葆与许地山、阜士德等教授一同推进在港“平民教育运动”；关于港大的中文教育改革，陈君葆与许地山、马鉴一致认爲“衆意以为港大应以造就人材界中国用为目的，课程应求与内地需要联络。”；借演讲与授课机会，陈君葆在各学校开展演讲的主题几乎全部关于民族革命、新文学、新思想等主题。港大为陈君葆冲锋在香港教育与思想的第一线提供了机会与平台。

1937 年“七七”事变爆发，全面侵略战争开始，陈君葆的工作重心由文化“救国”转向宣传“抗战”。10 月 14 日，陈君葆在香港联青社发表题为《如何强化抗战心理》的演讲，这是爲了解决“中国富前的尤大危险是后方组织的不完全，与人心容易动摇，动摇则必至以私害公了。”巩固统一抗战心理。1938 年 10 月，广州几乎一夜失陷，香港所有人的神经都紧张起来，身处这混乱又动荡不安的社会，令人常常恐慌又忧心忡忡。1939 年 4 月，陈君葆在日记中写到：“我仍举毛泽东在扩大六中全会所作的报告之分析语之，以为持久阶段为时久暂将视自己努力如何及国际变化而定。”[5]此后，在国共广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陈君葆加入宋庆龄在香港成立的“保卫中国同盟”，与廖梦醒、邹韬奋、廖承志等成员组建起一个新的稳固的抗日救国阵线，陈君葆在这一时期的日记中常常记录保盟的工作会议和开展的实际工作。1941 年 12 月 3 日，保盟组织会议商议为抗战筹款事宜，而这也成为保盟的最后一次会议。12 月 8 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引发太平洋战争，香港形势紧张，警报频频。

3. 日本军政统治：有利用价值的文人

1941 年 12 月 25 日，英国在香港抵抗失败投降，日本开始了在香港三年零八个月的占领。在

尚未攻占香港前，日本政府已经确定了对香港的统治方针。根据 12 月 9 日司令部颁布的《香港、九龙军政指导计划》，日军占领后将“以恢复治安为先，之后迅速使香港成为我方军事基地。与此同时以建立颠覆重庆政权之政治战略基地为主要目标，施行强而有力之军政。”[6]日本期望以军政统治香港使其一能作军事基地，二能在政治上与重庆政权对抗。此时因内地战争涌入的大量人口使得香港负荷沉重而无法实施统治方针，命名为“归乡政策”的人口治理便成爲日本重塑香港社会的起点。在《指导计划》中具体规定为“尽量限制香港及九龙之人口。因此，务必迅速将低下阶层（尤其是流浪汉）强制迁移他地。但要保留我军基地之技术人员和劳动力。”[7]占领香港后，日军在 12 月 24 日专门公布《香港九龙地区人口疏散实施纲要》[8]对上述计划进行补充。这份《纲要》详细说明了疏散标准，规定如下：

除军部征用人员及下述各类人员外的人员原则上应进行疏散。但出于本人请求并获得军部许可之返乡者不在此限。

如下

1.需要进行机械作业的工厂从业人员(略)。

2.需要在当地工厂工作的从业人员(略)。

3.造船、制造机械及船舶修理厂之工作人员及船舶相关人员。

4.重庆方要员且持有兴亚院在留许可证之人员及将来有利用价值之华侨。

5.具有固定资产且有固定职业者。

6.农业生产及其他生活必需品生产之从业人员。

7.其他军部认为有需要之人员。”

在上文提到的被排除在疏散政策外的几类群体中，一部分是留下以保证香港社会生产生活正常运转的劳工，还有一部分是第 4 条提到的华人精英，“但以促进瓦解重庆政权为目的，能联络华侨及在港重庆政要人员并使之安居之必要措施，应积极推行。”[9]日军拉拢他们为日军政府服务，实施“以华治华”的政策，借助华人精英的协助共同统治香港。1941 年当日军开始进攻香港时，许多官员、商人或学者借助各种机会逃离香港以免成为俘虏。占领香港后，日本迅速扣押未来得及逃离的要员，以各种手段限制离港并要挟其协助日军开展工作。1942 年 1 月日军在半岛酒店召集 141 名在香港有威望的人士开会，包括官员、商人等华人精英，名为开会，实则是强迫他们与日军合作，其中就有未能逃走的重庆要员胡文虎、罗旭和等人。[10]在地方，日军设立地区事务所和区政府，区长都由该区域日军总督指定的华人担当，在“归乡政策”中，对各区进行人口登记与户口调查的工作便由区长负责。陈君葆在日记中写到：“今日调查户口，清早天未明云卿便起来烹茶，预备一切。七点三刻调查员已来把各处的人都叫到楼下门口去等候了，青叶区的区长，极其卖力，挨家挨户的去催人下楼，又不住地当街叫喊不怕力竭声息，手舞足蹈，调查员谁能及得他呢！”[11]区政府一级的官员都选拔自亲日派，在日本统治下强行完成身份意识的转变，自愿分担着日军统治香港的工作。

陈君葆是港大教师和图书馆馆长，又是常活跃于报业的作者，也必定是日军政府想要拉拢的华人精英，他从日军占领前就没有打算离港，此后又被加以监视，更没有离港的机会。陈君葆在日记中记载，自 1938 年起，由于大陆抗战形势严峻，许多沦陷区的珍贵的书籍都被运送寄存于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许地山去世后，这些书籍的保护工作便全由任图书馆馆长的陈君葆负责。随着日军对香港的进攻，这些藏书也无法再转运至其他地方，陈君葆便也选择与这些图书紧紧捆绑在一起。在他的日记中记载着：“如果有人问说是事不干己，何用乎如此勇往直前，则我亦不自解何以这样，不过慷慨赴义，我从来处世便是这样的态度，冯平山图书馆的事本来我可以置之不理的，但为着中央图书馆的一批书，为着顾全别人，我竟动于一‘义’字而不顾一切了。”[12]被日军关注的陈君葆在港生活，是否如《指导计划》中所说的“使之安居之必要措施，应积极推行”，从陈君葆的日记中，我们只能看到沉默、孤独、苦闷而又无可奈何的留港文人。日本对香港的殖民没有像英殖民初期那样遭到居民的重重阻碍，但是日据香港下的居民同样没有在战后统治下暂获安稳的生活。相反，日军对香港的完美构想使居民则在此统治下苦不堪言。

4. 香港沦陷时期：孤独的“孤岛文人”

在这一时期的日记中，已不能看到像抗日战争前期那位积极投身救国与抗战宣传的激情文人，而是作

出“他生未卜此生休，剩水残山重回首”[13]诗句的孤岛文人。对比往昔，香港是抗战文人的文化基地，陈君葆从事着自己热爱的文化教育事业，与众多志同道合的好友谈时势谈救国方案。再看今日，朋友与家人的离开，港大的封禁，日军的扣押,陈君葆尤其是在精神生活上，成为了剩水残山间的一座“孤岛”。

香港一沦陷，日军宪兵队长平川便迅速率领士兵到香港大学封查图书馆，并在其中发现了陈君葆想转运至美国的藏书。1 月 9 日，陈君葆和同事们被宪兵队长平川叫去盘问图书馆图书诸事，认为这些写有陈君葆名字的藏书是其“私通敌人”“盗取中国古物”的罪证，并将他扣留至万国银行，陈君葆解释清楚后才在第二日将其释放。在图书馆搜查期间，陈君葆时常被“扣留”，曾因搜到此前许地山所收的卫立煌寄存在图书馆的物件，又叫陈君葆谈话解释这批国民党相关的物件。搜查审查结束后，2 月 7 日肥田木命陈君葆协助恢复香港图书事业，“（肥田木）他所命的，是我要主持整个图事，其名称为香港图书馆，要我作一个计划，先事「搜集然后整理编制，以期此为一完善的东方图书馆」。关于用人方面亦由我支配云。”[14]此后，陈君葆便在日军的变相的监视下不准离港，每日到办事室报道负责图书工作。在陈君葆的日记中，不仅要负责应付日本官员或记者的参观访查，还要外出到香港战后的学校、修道院、医院等有书籍的地方进行整理工作。至此，陈君葆经过了“有助于日军政府”这一生存规则的检验。但一些无法逃离香港又拒绝与日军政府合作的华人精英，则面临更加严峻的处境。陈君葆的好友文化界的名人陈寅恪在日军占领初期滞留香港，日军便加紧对陈寅恪劝降，用高薪诱惑等各种手段逼迫陈寅恪去日占区任教为日伪政权服务，陈寅恪一概拒绝。在陈君葆的日记中记载着陈寅恪的生活状态：“刘孙二人昨携米十六斤、罐头肉类七罐与陈寅恪，今日回来报告陈近况，据谓他已挨饥两三天了，此为之黯然。”“季明今天来说，昨天的计划，想设法替寅恪在港大的住宅找个住的地方。”[15]不仅吃住困难，陈寅恪还因不合作被日军以性命威胁。5 月 1 日陈君葆在日记中写到：“早上接到寅恪先生写给我和季明的信，说他日间要从广州归乡，过海后或到平山图和中文学院作最后一眺望，并谓「数年来托命之所今生恐无重见之缘，李义山诗云，他生未卜此生休，言之怀哽。」我当时读到此不忍再读下去。”[16]5 月 5 日，陈寅恪在朱家骅的营救下乔装转移离港。能被营救尚属幸运，其他被留在香港无法逃离的华人精英或许只能如陈君葆一样，达成“有助于日军政府”的检验，与日军政府“合作”直至抗战结束。

为日军恢复图书事业并未使陈君葆及家人的生活拥有保障，陈君葆所得报酬也赶不及香港日益膨胀的物价和愈加紧缺的物资。“去领薪水，盖章取来是军票一百一十元，这数目自然很少，便是他们也常提到说少得很不像样。”“回到家里来，因为米已不够了。只好依每期米吃两顿稀饭之办法，又来一次吃粥了。”“计为面粉乙事曾费多人的心，历时多天，才领得。”[17]在日记中也常有他向朋友借钱的记载。最重要的是，身处这混乱又动荡不安的社会，令人常常恐慌紧张，陈君葆记载家人常感觉“提心吊胆”“忧心忡忡”。因此，陈君葆虽被迫留港，却一直找机会让家人离港去安全的地方。1942 年 3 月 14 日，陈君葆长女陈云玉离开去往澳门；4 月 14 日，陈君葆儿子陈文蔚坐船离开去澳门；5 月 26 日，陈君葆送别夫人郑云卿同三子陈文达，在这一天的日记里作者写到：“送了云卿和两个小儿女到了澳门去之后，心里好像少了好些挂虑一样，轻松了不晓得多少。”[18]在这一天陈君葆也彻底只剩一人在香港，他对于家人的思念常常在日记与书信中表达。接到女儿云玉的信后写《接云玉信有感漫成一绝》：“一水迢迢隔好音，去鸿来雁苦追寻；不逢离乱居夷日，谁信家书抵万金。”[19]；收到妻子寄来的信后写道：“梁园风疾见鸢飞，云树苍茫想蕨薇，垂老益悲身是客，独余清泪对斜晖！”[20]在陈君葆眼中，自己或许就像李煜诗中远离家园被拘夷地的囚徒。表面看来，陈君葆与日军政府达成合作并且定时获得政府报酬，似乎应该在日据香港过着稳定且有保障的生活，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侵略战争使他不得不生活在动荡的社会、被迫与当权者合作、面对家人的分离与朋友的绝望，而只能通过书信表达心中的愤懑与忧伤。

5. 香港沦陷时期：苦闷的的“落水文人”

占领香港后，日军便采取了系统性的舆论控制措施，意在限制和引导香港居民的思想和表达，统一“大东亚共荣圈”的意识形态，以此来消除反日情绪、压制反抗势力，维持对香港的稳定统治。在这种形势下，文人群体的身份也决定了他们不会像作业工人或农民百姓那样仅被视作为保持香港社会正常运作的“劳动力”，他们是日军政府拉拢优待的对象。一部分或因投机或为生存而迎合日伪政权需要，“历史学家用‘落水文人’这一术语来形容那些向敌人政权屈服，违背自己国家的知识分子……当大雨倾盆时，光是把头露出水面是很难的。”[21]有学者在研究上海沦陷时期时，认为一部分文人选择“大隐隐于

市”拒绝为日伪政府写稿教书。但在日据香港，陈寅恪也想“大隐隐于市”，但严苛急切的日军政府不允许有这种选择。在时刻存在的政治压力中，个人的行为选择与内心取向会因为政治政策与环境而存在差别，这也是日据留港群体普遍的矛盾心理。虽然陈君葆在香港协助日军政府建立图书馆，但是我们还需要认真考察这一行为背后的真实想法，他在日记中写到对参与政治的态度：“政治生活现在才来参加未免太迟了；若在摆脱后又来作下车之冯妇，那蝇营狗苟，实在不堪重味！这一段话实未可厚非。”[22]这是陈君葆1942 年 9 月份在日记中的记载，对于参与政治他是持抗拒甚至鄙夷的态度。之后他又写到：“至于立场两字也至空虚，今日之所是，明日未尝不可成非，这固然。但使人苦闷的是，在目前的情况下有甚么办法，只能做些力所能及的事了。”陈君葆亲身感受着香港社会的动荡也清醒地认识到政局的不确定性，他无法谈立场是因为他已经被迫卷入日本政府，社会状况裹挟下他对于自己行为与想法的偏差也无能为力。这正是“落水文人”们行为与思想之间的含糊、复杂。

陈君葆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力远离政治行为。“晨早到图书馆，文教课送来矶谷总督的请帖，我心裏一想这大概是联络文化界的宴会，与神田教授言不无连带关系的，后闻文教课打电话来果然。我以灯火管制，又恐晚上戒严，本想不去，后闻卢希鋆谓只请文化界几个人才答应了去。”[23]“叶灵凤们组织新闻学会邀我作名誉会员，已设法推辞，今天他们开成立大会，灵凤又写信来约去参加并说「总督也出席，而且有午餐」，我待不去，他打电话来说「座位是排好的，缺席恐不好看」，于是我只得去了，在一方面看，倒像哺餟也似的。”[24]与图书馆工作不相干的事务陈君葆都尽量推脱，在与朋友们约会聊天时，记录的内容往往也只是谈论文艺，不涉其他。从陈君葆此时期的文集来看，他往往只是写一些文艺小说、读书杂记或是只做些翻译工作。在日据香港之前，陈君葆最后一篇时评类文章是于 1941 年 3 月 15 日写于《保卫中国同盟通讯》的《日本的南进侵略》，他在文中评价美国应当“大规模地资助中国，务使日本从中国的各战场抽不出一个人来加入南进的企图，那末才可以掣住日本侵略者的魔手。”[25]此后，陈君葆的时评直至 1945 年 3 月 15 日才再次出现在《华侨日报》，再写时评并不是陈君葆想接触政治，而更多是因为生计所迫。这一时期的时评，陈君葆几乎不提日本相关，写的都是世界范围内其他国家的状况，并且评论性文字大大减少。

6. 结语

当 1945 年 1 月，陈君葆在完成香港图书馆的建立时，回忆起被肥田木交代图书整理工作韧始，他在日记中写到：“一面着我计划，一面却不交钥匙与我，而另设办事室于军调查班楼上，这意思已使我有点忿，可是在那种形势之下只好顺其自然了。”[26]陈君葆与日军政府，彼此从未相互信任，更多是逢场作戏，各取所需。就像陈君葆是看清现实后的不得不“顺其自然”，而日军也是束手无策不得不“着他计划”，两者之间互相敌视、怀疑、对抗，但终因现实所需仍然达成合作。这种矛盾、别扭但又束手无措的状态普遍存在于日据时期的香港。当抗战胜利后，戴望舒被检举为附敌时，他在《我的辩白》中所说：“我觉得横亘在我的处境以及诸君的理解之间的，是那日本占领地的黑暗和残酷。”“我的抵抗是消极的，沉默的。……我能做到的，如此而已。”[27]这些文人可能也想“大隐隐于市”，但有些因为责任，有些因为生存，不得不被裹挟入这个政治漩涡，从而因为政治政策与环境造成个人的行为选择与内心取向的差别。

References

1. Xie, Ronggun. (2004). 陈君葆日记全集 卷一：1932–1940 [The Complete Diaries of Chen Junbao, Vol. 1: 1932–1940]. Hong Kong: The Commercial Press (HK). ISBN: 9789620743467.
2. Xie, Ronggun. (2004). 陈君葆日记全集 卷一：1932–1940 [The Complete Diaries of Chen Junbao, Vol. 1: 1932–1940]. Hong Kong: The Commercial Press (HK). ISBN: 9789620743467.
3. Xie, Ronggun. (2004). 陈君葆日记全集 卷一：1932–1940 [The Complete Diaries of Chen Junbao, Vol. 1: 1932–1940]. Hong Kong: The Commercial Press (HK). ISBN: 9789620743467.
4. Xie, Ronggun. (2004). 陈君葆日记全集 卷一：1932–1940 [The Complete Diaries of Chen Junbao, Vol. 1: 1932–1940]. Hong Kong: The Commercial Press (HK). ISBN: 9789620743467.
5. Xie, Ronggun. (2004). 陈君葆日记全集 卷一：1932–1940 [The Complete Diaries of Chen Junbao, Vol. 1: 1932–1940]. Hong Kong: The Commercial Press (HK). ISBN: 9789620743467.
6. 23rd Army Headquarters. (1941, December 9). 第 23 军香港、九龙军政指导计划 [Military and Administrative Guidance Plan for Hong Kong and Kowloon by the 23rd Army]. Research Archive of the Defense Agency. Shōwa 16 Riku-shi Secret Large Diary, No. 64.

7. 23rd Army Headquarters. (1941, December 9). 第 23 军香港、九龙军政指导计划 [Military and Administrative Guidance Plan for Hong Kong and Kowloon by the 23rd Army]. Research Archive of the Defense Agency. Shōwa 16 Riku-shi Secret Large Diary, No. 64.
8. Watanabe, Takeshi. (2016). 香港出差报告 [Report on the Hong Kong Assignment]. In Kobayashi, Hideo & Shibata, Yoshimasa (Eds.), 日本军政下的香港 [Hong Kong under Japanese Military Rule] (p. 53). Hong Kong: The Commercial Press.
9. 23rd Army Headquarters. (1941, December 9). 第 23 军香港、九龙军政指导计划 [Military and Administrative Guidance Plan for Hong Kong and Kowloon by the 23rd Army]. Research Archive of the Defense Agency. Shōwa 16 Riku-shi Secret Large Diary, No. 64.
10. Greater East Asia Co-Prosperity Organization. (1942, January 10). 港九中国绅士录 [Who's Who of Chinese Gentlemen in Hong Kong and Kowloon]. Research Archive of the Defense Agency. Shōwa 17 Luya Secret Large Diary, No. 7.
11. Xie, Ronggun. (2004). 陈君葆日记全集 卷二：1941–1949 [The Complete Diaries of Chen Junbao, Vol. 2: 1941–1949]. Hong Kong: The Commercial Press (HK).
12. Xie, Ronggun. (2004). 陈君葆日记全集 卷二：1941–1949 [The Complete Diaries of Chen Junbao, Vol. 2: 1941–1949]. Hong Kong: The Commercial Press (HK).
13. Chen, Junbao. (2018). 以陈寅恪他生未卜此生休语集义山句成四绝 [Four Quatrains Inspired by Chen Yinke's Saying and Li Shangyin's Lines]. In Xie, Ronggun (Ed.), 陈君葆诗歌集 上册 [Collected Poems of Chen Junbao, Vol. 1] (p. 84). Guangzhou: Guangdo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4. Xie, Ronggun. (2004). 陈君葆日记全集 卷二：1941–1949 [The Complete Diaries of Chen Junbao, Vol. 2: 1941–1949]. Hong Kong: The Commercial Press (HK).
15. Xie, Ronggun. (2004). 陈君葆日记全集 卷二：1941–1949 [The Complete Diaries of Chen Junbao, Vol. 2: 1941–1949]. Hong Kong: The Commercial Press (HK).
16. Xie, Ronggun. (2004). 陈君葆日记全集 卷二：1941–1949 [The Complete Diaries of Chen Junbao, Vol. 2: 1941–1949]. Hong Kong: The Commercial Press (HK).
17. Xie, Ronggun. (2004). 陈君葆日记全集 卷二：1941–1949 [The Complete Diaries of Chen Junbao, Vol. 2: 1941–1949]. Hong Kong: The Commercial Press (HK).
18. Xie, Ronggun. (2004). 陈君葆日记全集 卷二：1941–1949 [The Complete Diaries of Chen Junbao, Vol. 2: 1941–1949]. Hong Kong: The Commercial Press (HK).
19. Chen, Junbao. (2018). 接云玉信有感漫成一绝 [A Casual Quatrain Upon Receiving Yunyu's Letter]. In Xie, Ronggun (Ed.), 陈君葆诗歌集 上册 [Collected Poems of Chen Junbao, Vol. 1] (p. 47). Guangzhou: Guangdo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 Chen, Junbao. (2018). 看云卿信后有感一绝 [A Quatrain Upon Reading Yunqing's Letter]. In Xie, Ronggun (Ed.), 陈君葆诗歌集 上册 [Collected Poems of Chen Junbao, Vol. 1] (p. 54). Guangzhou: Guangdo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1. Chow, K. (2019). City in the Rain: Writers, Editors, and Publishers in Hong Kong during Japanese Occupation [Doctoral dissertation,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Academia.edu. URL: https://www.academia.edu/96179140/City_in_the_rain_writers_editors_and_publishers_in_Hong_Kong_during_Japanese_occupation
22. Xie, Ronggun. (2004). 陈君葆日记全集 卷二：1941–1949 [The Complete Diaries of Chen Junbao, Vol. 2: 1941–1949]. Hong Kong: The Commercial Press (HK).
23. Xie, Ronggun. (2004). 陈君葆日记全集 卷二：1941–1949 [The Complete Diaries of Chen Junbao, Vol. 2: 1941–1949]. Hong Kong: The Commercial Press (HK).
24. Xie, Ronggun. (2004). 陈君葆日记全集 卷二：1941–1949 [The Complete Diaries of Chen Junbao, Vol. 2: 1941–1949]. Hong Kong: The Commercial Press (HK).
25. Chen, Junbao. (2018). 日本的南进侵略 [Japan's Southward Invasion]. In Xie, Ronggun (Ed.), 陈君葆文集 上册 [Collected Works of Chen Junbao, Vol. 1] (p. 47). Guangzhou: Guangdo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6. Xie, Ronggun. (2004). 陈君葆日记全集 卷二：1941–1949 [The Complete Diaries of Chen Junbao, Vol. 2: 1941–1949]. Hong Kong: The Commercial Press (HK).
27. Dai, Wangshu. (2017). 我的辩白 [My Defense]. In Lu, Weilian & Zheng, Shusen (Eds.), 沦陷时期香港文学作品选——叶灵凤、戴望舒合集 [Selected Literary Works from Occupied Hong Kong: Ye Lingfeng & Dai Wangshu Collection] (p. 329). Hong Kong: Tianditu Books Publishing House.